

章学诚的知识论

——以考证学批判为中心

[日] 山口久和 著
王 标 译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世纪出版

上架建议：中国哲学

ISBN 7-5325-4542-3



9 787532 545421 >

定价：28.00元

易文网：www.ewen.cc

章学诚的知识论

——以考证学批判为中心

[日] 山口久和 著
王 标 译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章学诚的知识论：以考证学批判为中心 / (日) 山口久和著；王标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12
ISBN 7 - 5325 - 4542 - 3

I. 章... II. ①山... ②王... III. 章学诚 (1738~1801) —经学—学术思想—研究 IV. B249. 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20729 号

Copyright © 山口久和 (Hisakazu Yamaguchi), 1998

《章學誠の知識論》(日本, 东京, 创文社, 1998)

Translated from the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A Theory of knowledge of Chang Hsueh-ch'êng

by Hisakazu Yamaguchi

Published in 1998 by Sobunsha, Tokyo, Japan

章学诚的知识论

——以考证学批判为中心

[日] 山口久和 著

王 标 译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www.guji.com.cn

(2) E-mail：gujil@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www.ewen.cc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经销 上海顥辉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1.25 插页 4 字数 262, 000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 - 3, 300

ISBN 7 - 5325 - 4542 - 3

B · 582 定价：28.00 元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六”，落离木丘，中都春歌。”“史官造六”偶遇，强喻的则用往日歌文
闻中其，深灰迷知神不持杀宜一翁墨空六。“若若若六”明“史官造
半”。“然也”是知五，虚情知果采也“合仰”山下丁脚游，强墨知知
“少”“弱”书采要弱力，“然其形”其以城玉“然”“其民知此不法
叶曲”“皮若客百飞南”送祖送其歌歌婆婆来言，“歌”得从来中
的步试引曾权枝首具归照。序

山口久和教授的《章学诚的知识论——以考证学批评为中心》，原是八年前日本创文社“东方学丛书”之一种，这本精湛之作现在由山口教授的高足王标博士译成中文出版，实在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

对于中国学术界，章学诚是一个并不生疏的名字。1920年，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把章学诚看作被清代汉学正统派掩盖了的异端，因而强调其思想解放的意义：“学诚不屑屑于考证之学，与正统派异……书中创见类此者不可悉数，实为晚清学者开拓心胸，非直史家之杰而已。”^①数年后则称之为“清代惟一之史学大师”^②。不过，系统的研究则当从胡适开始，那是受了日本学者内藤湖南1920年出版的《章实斋先生年谱》的刺激，两年以后出版了一本《章实斋年谱》，他如此表白自己的心境：“最可使我们惭愧的，是第一次作《章学诚年谱》的乃是一位外国学者。”当时的胡适也只是把章看成是“专讲史学的人”^③，而且其研究的深度似乎尚不能与内藤湖南比肩。

从此以后，以“六经皆史”为中心来理解章学诚成为主流，或者视之为“主张‘六经皆史’的历史学家”，或者以历史主义为内核来解释其历史哲学。认为章学诚受黄宗羲的历史主义的影响，充分

发挥了王阳明的命题,强调“六经皆史”:理在事中,道不离器,“六经皆史”即“六经皆器”。六经是在一定条件下的政教典籍,其中所记载的是器,说明了当其“时会”应采取的措施,这就是“当然”。学者不但应知其“当然”,还应知其“所以然”,这就要求在“器”、“史”中来认识“道”。后来龚自珍则将其发展为“诸子百家皆史”。他们的理论之核心乃在于:道展开为历史。所以只有对对象作历史的考察,才能把握道^④。

另一些学者比较注意从与乾嘉学派的关系,特别是与戴震的关系来研究章学诚的思想与学术。乾嘉学派所代表的清代朴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是20世纪学者们关心的问题之一。当初胡适就曾经将清代汉学的精神称之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并进一步将之比于自然科学的实证精神^⑤。后来更有了余英时先生的名著《论戴震与章学诚》,那本书的主旨似乎是论证清代考证学的思想史意义,乃在于儒学由“尊德性”转向“道问学”,表明了“儒家智识主义(Confucian intellectualism)的兴起”。余氏认为,章学诚与戴震一样是这一过程的中心人物:“然东原斥程朱即所以发挥程朱,实斋宗陆王即所以叛离陆王,取径虽异,旨则归一,则两家之貌异终不能掩其心同。”^⑥

余氏此书之作,自然有批评以研究儒学形上学为其专长的现代新儒家忽略“道问学”的意思。他直接点名道姓地批评的是冯友兰,其实,不仅冯友兰1934年出齐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后来的《中国哲学史新编》都没有提及章学诚;牟宗三的《中国哲学十九讲》、《中国哲学的特质》、《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历史哲学》等书也没有怎么论及章学诚。

概而言之,在相当一段时间内,除了在清代哲学史或“浙东学派”的学案研究中间或提及章学诚之外,汉语著述界对章学诚思想

的专门研究多少显得有些寥落,尤其是对章学诚哲学的研究,似乎竟可以说是沉闷。

读完山口久和教授的《章学诚的知识论——以考证学批评为中心》,随着他那如层层剥笋、如蚕茧抽丝一样绵密的论证,在那些已经近乎老生常谈的话头后面,一个新的章学诚豁然呈现。

毋庸赘言,山口教授对于有关章学诚研究的各种文献,包括中国、美国和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都有透彻的了解,因而在自己与章学诚的文本以及上述二手研究三者之间,构成了紧密的对话。作为一个曾在京都大学接受中国哲学专业训练的日本学者,他对资料占有之翔实、考辨之精审,相信可以经得住最挑剔的审视。不过,作者的宗旨并不在于对章学诚的思想进行历史的、客观的整理和分析,而在于对章学诚的哲学做创造性的诠释。换言之,用我们在日本中国学研究中通常见到的长于实证研究、短于理论创造来看待山口教授的这一著作,是完全的错置。借用章学诚的范畴,毋宁说,这部著述的特点是:在沉潜功力中透出高明性灵。

中国读者将不难发现,与通常集中在以“六经皆史”来把握章学诚的著作不同,山口教授的这本书“试图在实斋复杂多样的主张背后解读出对知识主观契机的恢复,从中对他的思想进行整体把握”。这里有一个在全书中反复出现的关键词:知识活动的主观性契机。

日本的中国研究对历史分期有一个基本的判断,“根据内藤湖南博士的观点,中国近代(宋、元、明、清)的成立,具有平民的发展和政治重要性的衰退这两个根本特征(参照《东洋文化史研究》所收《近代支那的文化生活》)。在思想学术领域中,这两个根本特征以自由研究、自由批判的形式表现出来”^⑦。文化形式的细分化出现了,传统的“学问”发生了知识和智能的分离。在其末期,因为种

种因缘，知识的主体即知识分子本身也发生了从“儒者”(Confucian)向“学者”(scholar)的转变。所谓“学者”，山口教授“将它作为一个有别于生活感情、信仰伦理，或者政治意识形态的智识活动从业者，在这个意义上进行使用。大概比较接近西欧的humanist这个词汇所持的含义”^⑧。从事此类多少有些价值中立意味的知识活动，或者说是中性的知识活动，本身成为一种职业。于是出现了类似后来马克斯·韦伯在《以学术为业》中描述的那样：“作为‘职业’的科学，不是派发神圣价值和神启的通灵者或先知送来的神赐之物，而是通过专业化学科的操作，服务于有关自我和事实间关系的知识思考。”^⑨这样一种对待知识的态度及其生存方式，在阎若璩、章学诚等“学者”身上，有了最初的体现。这与德川时代(1600—1876)的日本发生的情况有某些相似，甚至很可能是近代化来临前的普世化现象。

正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本的时代判据上面，才有所谓“知识活动的主观性契机”。因为韦伯式的学术“知识”，它表现出一种自律倾向，即以知识自身为目的，故而有所谓“为学术而学术”、“为艺术而艺术”等等；同时，知识生产也表现出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增长的趋势，它的进步同时还由于既有的知识在时间流中存在着被修正和超越的可能性——这使它区别于神圣性的“知”或经学家所追求的永恒的“道”。需要进一步追究的问题是：这样的知识生产和增长的动力何在？在这样的追问下，我们已经可以看到“知识活动的主观性契机”的端倪：知识以自身为目的，目的因转变为动力因，“学者”的存在或学术活动的主体性自身即是动因。借用章学诚的范畴，就是在“尊德性”的导引下从事“道问学”的活动。

山口教授在细密的行文中不断揭示，通过对占据主流地位的考据学的批判，章学诚如何在“道问学”的土壤之中滋养“尊德性”

的精神。山口教授说：“向‘尊德性’的倾斜，在‘专家’（此处的“专家”是指章学诚所说的能“成一家之言”的人——引者注）那里是头等重要的。余英时借用柯灵鸟的用语，把知识所拥有的这种契机称为‘先验的想象’，我则想强调它更接近德国解释学派的‘前见’（Vorurteil）——学术活动中的预先判断——这个概念。”^⑩章学诚高度推崇的“神解精识”、“别识心裁”，其最初的动因正是主体与对象之间微妙的契合：“宇宙名物有切己者，虽锱铢不遗；不切己者，虽泰山不顾。”是否“切己”，才是引起主体关注的关键。

对于人们说的章学诚“发现有我”和“发见自我”，山口教授认为这就是“主观性的自觉”。与西方哲学知识论传统中主体性概念——纯粹理性的认识主体——不同，这里的“自我”、“主观”应该在解释学的框架中展开。它不再只是干燥的理性之光，而指向了完整的人。因而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具体概念，不仅包含了认识活动中的“前见”，而且有所谓“性情”，更进而达到“人格”。章学诚尝曰：“夫学有天性焉，读书服古之中，有入识最初，而终身不可变者是也。学又有至情焉，读书服古之中，有欣慨会心，而忽焉不知歌泣何从者是也。功力有余而性情不足，未可谓学问也。性情自有而不以功力深之，所谓有美质而未学者也。”（《文史通义·博约中》）即使是考证学这样貌似客观的学术活动，其真正的动力，也只能来源于天生的资质和真诚的感动。而它们最终指向着“性灵”。如果在康德认识论中，“我”作为统觉，是知识经验的首要条件的话，“性灵”就是文史之学中的“我”，它使知识经验统合化；这种知识活动本身又反过来培养着人的性灵。换言之，章学诚的认识活动从“我”出发，又指向着“我”。也许正是在这一层意义上，山口教授断言：“可以说实斋的‘性灵’观念是最能表现其全面推出认识主体主观性的特异学术论的概念。”^⑪

所有这些，都是通过诠释章学诚之清代考据学批判而展开的。这一批判，从“知识活动的主观性契机”的不同意识，进而扩展到一般的方法论和语言哲学领域。与实证主义的考据学强调归纳与演绎的逻辑不同，章学诚重视对对象的整体把握和直觉；与考据学强调从局部推向全体的认识路径不同，章学诚以为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恰恰是对“宗旨”的把握，它比对细部的认识有无可争议的优先性。这种方法论上的分歧，与对传统的言意之辩的不同解答有密切的关联。以追求圣人之意为中心的考据学，有一个毋庸置疑的前提，就是经学的文本可以表达神圣的知识；而将“性灵”置于知识活动中心的章学诚却更倾向于“言不尽意”的传统，“其真知者，以谓中有神妙，可以意会而不可以言传者也”。而，张之洞的《书林中集》中录有章学诚的“

不难发现，章学诚对清代考证学的批判，正可以映照出山口教授对当今日本中国学主流的质疑。尽管此书掌握资料之周详、对相关论点的考辨之精审，在我读过的中国哲学家专论中，实在是罕见的。这表明作者是真有资格采取如下的态度：本书自序中，作者毫不讳言他对日本中国学界拘泥于实证方法这种保守性的批评。而其内里，是来自对所谓“人文科学”或“精神科学”解释学方法的自信。狄尔泰曾经说，在精神科学中，精神的联系，作为一种本源上给定的联系，是理解的基础。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精神上的联系，我们通过自身内在的体验进入他人的内心，进入人文世界。现在我们经常见到一些人，拿着西方哲学的某些理论作为工具，生硬地肢解中国思想文献，或者像蜘蛛吐丝般演绎出似乎大有新意的老生常谈。《章学诚的认识论》与它们全然不同，统篇给你的感觉，就是著者与章学诚之间那种深刻的“精神的联系”，通过理解章学诚，著者也敞开了自己的性灵。这在学术越来越被现代学院体

制所“规范”，人文学科的研究和著述活动越来越服从商品交换法则的今天，实在是弥足珍贵的。

山口教授在将此书稿交出版社的同时，嘱我为其做序。章学诚自己说过，“书之有序，所以明作书之旨也，非以为观美也”（《文史通义·匡谬》）。我对章学诚并无专门研究，本非作序文的合适人选。只是此书中译本的出版与我的怂恿推荐有关，所以向读者推荐之责又是我不能推辞的。但是，写下这些文字，决不敢说我已经明了“作书之旨”，而只能借这篇急就的读后感来表达我内心的羡慕之情：尽管我像本书作者一样希望看到读者，特别是章学诚研究的专家们的批评——在此一定存有开放的空间。但是我确信，这本书的出版不仅将成为章学诚研究的新界碑，而且也给整个中国哲学史研究吹来了一股清新的风。

高瑞泉

丙戌年仲夏于沪郊寓所

注 释

- 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57页。
- ②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446页。
- ③ 《胡适全集》第二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81页。
- ④ 《冯契文集》第八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09页。
- ⑤ 这一观点他终身未改。直到1959年的《中国哲学里的科学精神与方法》一文，他还是说，从朱熹到清代汉学家，这些“只运用‘书本、文字、文献’的大人物”，给中国“传

下来一个科学的传统,冷静而严格的探索的传统,严格的靠证据的传统,大胆的怀疑与小心的求证的传统——一个伟大的科学精神与方法的传统,使我们当代中国的儿女,在这个近代科学的新世界里不觉得困扰迷惑,反能够心安理得”(《胡适全集》第八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513页)。

⑥ 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三联书店,2000年,第90页。

⑦ [日]岛田虔次:《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

⑧ [日]山口久和:《中国近世末期城市知识分子的变貌:探求中国近代学术知识的萌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一期。

⑨ 马克斯·韦伯:《以学术为业》,三联书店,1998年,第45页。

⑩ 本书第41页。

⑪ 本书第202页。

中译本自序

拙作的中译本,这次由优秀的清代思想史专家且精通日语的王标博士将其翻译付梓,实乃作者的望外之喜。关于章学诚的学问和思想,法兰西学院的戴密微(Paul Demieville)教授^①和斯坦福大学的倪德卫(David S. Nivison)教授^②已经撰有优秀的专题著作,在中国,浙江大学的仓修良教授孜孜不倦地发表了一连串的研究论文。此外,近年在中国大陆和台湾还举办了有关章学诚的国际学术会议。这些似乎让人觉得目前的章学诚研究展现出了空前的盛况,但是在我看来,这些东西方硕学的章学诚研究以及大陆、台湾的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③有一个共通的特征。一言以蔽之,就是始终停留在对章学诚思想进行历史的客观的整理和分析。在思想史研究中,这种做法本身并不值得大惊小怪。然而,在思想史中,夹杂在已经完成了其历史使命而装饰着思想史辉煌殿堂的众多思想家之中,有极少数的先觉,他们的思想至今还在放射着光彩陆离的光芒。恕我以偏概全地说,先秦荀子、后汉王充、唐代慧能、北宋邵雍、南宋朱熹、明代李贽、清代王夫之以及章学诚等,就是属于这稀有的部类。要想对这些先觉的知的全貌穷其究竟,仅仅依靠一边倒地倾向于历史性和客观性的实证研究是无法完成的。只有从历史性和客观性向前迈进一步,通过从研究者各自所处的“现

在”的视角,由研究者自身对先觉们的知的有效性进行主体性的重新质疑,才能实现对思想的全面理解。我虽然这么觉得,但并不等于我就主张在客观分析之后必须伴随着主观的综合,或者说思想史研究归根结底应该具备研究者的主观评价等这样的谬论。对作为他者的思想家的知进行穷原竟委的行为,说到底就是在客观分析和主观理解相互争衡的临界点勉强形成的极为微妙的精神活动。这正是我从章实斋先生那儿学来的。

现在,西方哲学史研究呈现出活跃景象的,不是煞费苦心于对过去的思想进行解剖和标本制作,而是试图从过去的思想中汲取鲜活的养分。从 2500 年前柏拉图的国家论到现代的社会哲学,从中学习汲取了许多东西,新托马斯主义努力把中世纪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说积极地运用于现代的各种问题,此外,从亚里士多德的存在论中充分汲取了养分的海德格尔建立了宏大的存在哲学。认为和西方哲学相比,中国古代哲学是已经完成其历史使命的资料残骸的看法是肤浅的见解。至少就章学诚而言,他的思想并不局限于世上盛传的“六经皆史”说(历史相对主义)。相反,他的思想精髓中隐藏着可以把他者理解的方法论、文本论、语言哲学、存在论等人文科学的整体纳入理论射程之内的可能性。外国人姑且不论,为什么中国的学者们没有对这位蕴含着知性之丰富可能性的特异思想家进行热切的关注呢?我对此甚感不可思议。

一般说来,日本的中国学界现在依然将清朝考证学的方法论视为金科玉律,把尽可能紧贴文本,进行枯燥乏味的实证研究视为理想。在日本的这种学风之中,本书多少有些引人注目,但是,并没有对我的章学诚论从正面进行批判,或将其视为问题。日本虽然享有率先将章学诚的思想介绍给世人的荣誉,但现状是很让人遗憾的^④。和日本的学术界不同,中国学术界在援用西方各种学

术方面是很积极的,而且连绵不绝地继承了清朝考证学严密的治学精神,我很想知道中国的学术界将如何评价我的章学诚论。

最后,对识赏拙作的价值并怂恿我出版中译本的华东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院长高瑞泉教授的学恩,在此深表谢忱。

山口久和

2006年5月28日星期日于大阪寓所

注 释

① [法] Paul Demieville(戴密微): *Chang Hsüeh-ch'êng and His Historiography, in Historians of China and Japan*, ed. by Beasley and Pulleyblank, Oxford U. P., 1961.

② [美] David S. Nivison(倪德卫): *The Life and Thought of Chang Hsüeh-ch'êng*, Stanford U. P., 1966. 杨立华译:《章学诚的生平与思想》,台北:唐山出版社,2003年。

③ 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编:《章学诚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

④ 章学诚的思想由内藤湖南的《章实斋先生年谱》而第一次被介绍给了日本学术界。随后又有胡适博士的同名著作《章实斋先生年谱》问世,使章学诚的研究迈上了轨道。

目 录

序	高瑞泉	1
中译本自序		1
第一章 序说——兼研究史摘要		1
第一节 两种《文史通义》		1
第二节 章学诚形象的视点、“六经皆史”说的偏重		4
第三节 章学诚思想的构造		15
第二章 章学诚在思想史上的位置		29
第一节 围绕浙东学派的诸问题		29
1. 何炳松的“程颐学统”说		30
2. 全祖望的“陆学”说		35
3. 《浙东学术》篇的创作意图		38
4. 戴震批判与《浙东学术》		46
第二节 朱子学与陆王学		52
1. 道问学与尊德性		52
2. 博约论		62

第三章 围绕“六经皆史”的诸问题	80
第一节 “六经皆史”说的意义	80
第二节 “六经皆史”说前史——道家、王充、王通、陆龟蒙、邵雍、南宋事功学派、刘因	90
1. 进行前史追溯的理论前提	90
2. 道家	92
3. 王充、王通	98
4. 陆龟蒙	100
5. 邵雍、南宋事功学派(陈傅良、陈亮)	104
6. 刘因	111
第三节 王阳明的“五经亦史”说与王学右派	113
第四节 古文经学与“六经皆史”说	126
第四章 向经学世界的挑战	141
第一节 知的三种类型	141
1. 风气论	141
2. 知的三种类型	146
第二节 六经与道——道器论	153
1. 《原道》篇的理论射程	153
2. 道与圣人	156
第五章 恢复学术认识中的主观契机	169
第一节 章学诚与宋儒——其学术的类似性与异质性 ...	169
第二节 知的主观契机	172
1. “天性”与“至情”	172